

# 战争文学的另一种叙述

——读曾剑的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  
□蔡桂林

作为人类文化、民族文化一种形态的战争文学，不能否定其“宏大叙事”给我们的阅读视野。比如《红日》，比如《保卫延安》，比如《解放战争》，通过对一场战争或一场战争中某一战役的宏阔描写，以史诗的品格，带给我们关于战争历史性的整体理解，流贯其中的英雄主义浩荡长风，振奋我们，鼓舞我们，召唤我们。当然，这只是军事文学的一种。还有一种，血肉横飞的战场只是一个切面，只是叙事背景，构筑其上的是一个丰厚生动、充满各种人生寓意的文学世界，这种寓意，由这种寓意所达到的艺术目的，成为对人类生活的开掘和理解，有着超越战争意义的精神回味。显然，曾剑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属于后一种。

江在山坡下伸向远方。江面是静止的，江水是流动的，细听，江水撞击着鹅卵石，清脆悦耳。岸边，一片高耸云天的巨大柳树，树冠如伞如盖，枝条飘逸成荫。绿荫下是一个小山村，几十户人家，房屋完好无损。院子严谨，错落有致，白发白裙的阿妈妮敲钹起舞，银发童颜的阿爸吉击鼓而歌，少女荡着秋千，儿童嬉戏欢笑，妇女们在江边的捣衣声隐约可闻，间杂着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叫声。突如其来地战争，把城市变成废墟，把乡村变成坟场，毁灭着一切世外桃源瞬间横尸遍野，面目全非。作家灵动的笔触，深入战争、战场的纹理，写出战争的残酷。宋春来、刘磨栓等一批才艺超群的文工团员，带着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成长背景，跨过鸭绿江，挺进战场。团员秋花说几句快板后追赶队伍，看见坡地横七竖八卧着的一片尸体，肚子都鼓胀着，她往旁边的草丛里一跳，不想正踩在一具尸体上，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扎实鲜活、具有强烈画面感的细节，令人惊悚战争的惨烈。当然，战争的残酷不仅在它对如诗如歌的生存环境的摧毁，更在于它中断了人的生命自然进程的长链，把死亡突然提前摆在没走到生命尽头的所有人的面前，检验人的应对态度，应对方式。《枪炮与玫瑰》执著于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写出人忘我的崇高、庄严的奉献和不灭的人性，强化着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里的爱与恨、悲与喜、无畏与无惧、高尚与卑劣等等人类的一切情感。面对战争，作家不是单单地记录枪声炮声，这是不能让读者稍感满足的，读者希望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战争背后的东西。《枪炮与玫瑰》完成了这样的给予，写足了严酷环境里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史，一半被战争的阴霾所覆盖，一半被战争的太阳所照耀。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史的本身，就是由战争这只魔掌揭开其第一页的。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中，已发生过一万四千多场战争，夺去了几十亿人的生命，毁灭的财产折合黄金，可以铺就宽10米、厚20公分的黄金路绕地球数以百周计。战争，是人类至今仍未能避免和消弭的巨大实在。它时而显露狰狞可怖的面目，时而潜伏到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处。也因此，战争文学史是世界文学史最重要的章节，战争文学几乎就是世界文学史的高峰。作家们借助于战争文学的激情描写，表达着关于社会、关于人生各种各样的思考，传递着关于战争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念。几乎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思考和观念，就没有战争文学。毋庸置疑，《枪炮与玫瑰》呈现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壮美，但它同时又给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灌注了崭新的内涵。躲在山上的敌人的小口径炮弹夺去了刘磨栓的生命，战友的牺牲使宋春来愤怒至极，暴跳着要上山亲自干掉那些敌人，团长告诉他：“战争并不是为了将敌人消灭，战争是伸张正义。战争是要让敌人屈服，而不都是死亡。”这样的思考，在此前的战争文学中相当罕见，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简直让人吃惊。它将人、人的生命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这样的几乎是颠覆性的战争观、价值观展开文学的描写，使《枪炮与玫瑰》获得了不仅仅属于文学的意义。战争，是人性美与丑、勇与怯蘸着鲜血、迸着火花的试金石。《枪炮与玫瑰》以一种全新的思想精神和姿态面对着战争这块试金石。生与死、爱与恨，是人类面临的两大永恒主题。爱是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的现象，也是人类印象最深刻的经验之一，它同希望、信念构成了人类生存意义的主干，这两大主题，在战争中获得最生动曲折、最丰富深厚、摄人心魄，几乎是终极性的呈现。《枪炮与玫瑰》为这样的终极性增添了新的内涵。

我想说，《枪炮与玫瑰》借大的战争背景抒写人性小我，形成一种具有自省意识的个性化讲述。人物命运感人至深，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历史纵深富于意味。细细研磨，它既有别于传统战争题材小说，也不同于《红高粱》《白鹿原》等新现实主义创作，它以广阔的审美视野，尽可能呈现出属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生存格局的力量，于对战争变幻的描写中把各式各样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写出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艺术地传达出战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美学内涵，具有较强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显示出战争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是近期军事题材作品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筑，因此，其表述结构、空间布排不应该是平面的，无论是梁、柱、椽、拱，都要通过榫来协调周边之关系，而且要让人看不到钉子，这才是合理的诗的建筑。

我觉得，诗从本质上说不是用来叙事的，其本体首先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保存形式。因此我认为，诗是应该直击真理和美感的，这样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通过韵律的脉动，去超越现实的疆界。按理说，长诗是应该靠诸多画面去点亮的，需借助暗喻而发光，从而去显示世界和灵魂的富饶，因为只有有这样，诗歌才能完全融入生活并被读者分享。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点点滴滴的现实来架构的世界里，诗歌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接近现实的手段。《铿锵之韵》对胡松夏来说，意味着他找到了某种诗的表达方式，以便使其他人理解他的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经历、感受和想法。可以说，长诗《铿锵之韵》是他个人经历的产物。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爱来了解他的意图和行为。因为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往往会低估了能够产生实际行动的潜在的理解和感知能量。

长诗《铿锵之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尽管我们已取得具有挑战性的技术进步，但我们依然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环境。胡松夏的诗里现出业已存在却无从看见的一切，他用诗的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让我们充满了对前途的信心，这就是诗的力量所在。其实，诗是可以稀释物质世界所带来的苦闷的，我们也可以从长诗《铿锵之韵》中，提炼出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民族精神。

艾略特说过：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我们的诗，只有在凝聚了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时，才能走向大气与凝重。

“草根”研究。余戈怀着军事历史“发烧友”式的专注与热忱，投入到松山之战的无限细微和琐碎之处，在没有任何史学抱负的情况之下，却拿出了中国内地抗战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成果。有读者——是历史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认为是“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足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意见。近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所谓“草根”一族的悄然生长，军史、战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面貌，那就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基本上没有功利色彩的“民间研究”，其基本的特质可简单归纳为“无定见”、“纯叙事”、“显微化”处理，以及文献资料的多样性。据作者称，他对“县一级文史资料选辑、新闻报道、网站专题、博客这样的为专业研究者所轻蔑”的资料，并不避讳，而是主要在甄别、比对上工夫。一些“军事发烧友”的业余研究成果，网络写手们无心插柳的采访“爆料”，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书中。我们看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注释条文和资料来源列表中，甚至标出了许多网站地址，读者完全可以自行去验证那些资料的可靠与否。在这本书的电子版出现在网络上之后不久，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跟贴讨论、知识订正和指谬，而且交流已经跨越了国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1944：松山战役笔记》首创“微观战史”的概念，这是把战史研究方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用这样的方法逼近近代历史、革命史上所有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争，无疑将是更加诱人的工作。同时，这本书也再次提出了问题：军史、战史研究如何摆脱功利主义书写而重获其学术的尊严？方法只是一面，终极的目标应该是历史认知中最为必要的客观、公正与翔实，而这是历史教育的基础。

# 微观战史的价值

□殷 实

要，因为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采用街头活报剧、枪杆诗、“故事新编”之类简易形式，更容易获得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与重人不重事，“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钱穆)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路线，以及我们自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区别在于，旧时的“文”并不是现在“文学”的意思，它可能包括具有“载道”功能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经国”文章，但并不包括引车卖浆的小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却似乎独与小说亲近，大量使用小说式的玄虚和耸动手腕。从字面看，可能是把对真实事件的交代理解为“报告”，而把主要以情节、细节、对话乃至心理活动、心理分析这样一些小说方法狭义化为“文学”了，因为现代小说成熟的叙述模式非常便于借鉴模仿。

《1944：松山战役笔记》因为聚焦的是一场非常具体的战事，在方法上又是按时序逐日推进，几乎所有的战术方法、战斗进程、攻防策略、战况演进以及不同阶段作战成效，都通过战斗文书、详报、日志，以及战后中、美、日三方参战人员的信件、笔记、回忆录等材料，进行仔细的对照和严格核实。这种我姑且称之为“战场考古学”的工作，对写作战史类著作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今天的“战争纪实”、“历史纪实”也具有示范价值。

文献、资料的“身份”识别

《1944：松山战役笔记》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在于，作者从事的是名副其实的

路的时刻。然而，这样的工作又是充满诱惑力的：当日军某天的一次偷袭行动出现在中、日、美三方事后的记录中而各有出入时，或者是当某一次阵地爆破后的歼敌人数，甚至被歼毙者的姓名、军衔、具体身世都通过对各方资料的对照而水落石出时，这种对当年战场上战事细节的精确还原，就会让读者感受到战史乃至“历史”的纯粹逼真，而不是粗略潦草的勾勒。至少在这样一个切近的距离下，谁都不会再脱出具体的“现场”而去生发各种感慨、臧否之类，又或是在种族、阶级、政治等层面高谈阔论了。我想，这就是成功的关键——让我们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从技(战)术层面，以战壕内军人的身体活动范围为限度，以战线的延展伸缩、火力的强弱消长为指标，面对一个绝对的战场空间，面对纯军事意义上的事实，也就是微观化了的战史。

军事历史叙述中的去文学化努力

《1944：松山战役笔记》并非没有叙述者的视角，也不是没有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观点，在一些章节中，我们甚至也能感觉到作者强抑的激愤。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所谓的文学性，这一点才是此书最值得观察的。历来我国演义文类发达，以至于对史志文类的真实准确多有消弭和掩盖。最近几十年以来则是一种叫做“报告文学”的文类昌盛。这种将历史故事化、文学化的冲动，一方面源于非常时期、危急时刻的国民动员、政治宣传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回家》，以其题材的独特及文学的功力，引起文艺界的关注，报纸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中国作家协会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作品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媒体分别刊发评论，台湾多家出版商争购图书版权，电视剧改编权最终被湖南广电集团获得。《回家》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也是战争文学、海峡两岸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对于小说的作者——军旅女作家张慧敏，也算是一次不小的突破。

《回家》以一个1948年冬跟随国民党军队溃退台湾的老人的一生为线索、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讲述两岸风雨60年关系。故事的主人公及他的亲人们，一生在革命、政治的波诡云谲中以难以割舍的亲情，和海峡两岸同宗同根的文化认同情结，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老兵对家乡、亲人几近绝望的怀想和“戒严令”解除后两岸的民间往来。其中，1948年国民党节节失利，最后溃退台湾的整个过程，由于主人公的亲历见闻及作家资料的翔实丰富，读来极具震撼力。作品一改战争只写硝烟和将帅的运筹帷幄的模式，从细小的边缘视角审视战争的残酷和无人性。主人公跟随国民党军队溃逃的这一段是最具文学性的人性拷问。

故事从1947年的山东菏泽讲起，主人公的父亲高金锡是菏泽城里的老国民党员，在一天夜里，被人突然杀害了。母亲认定是高庄惟一的共产党员、父亲的堂弟高金鼎告的密，因此狠心将只有12岁的儿子高秉涵推向了跟随国民党军队的不归路。母亲原以为儿子可以保命，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就到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一边是12岁的高秉涵跟随国民党军队退走台湾，一边是1949年10月，高秉涵的小姨和两个姐姐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回到了高庄。时代的巨手把玩着芸芸众生的命运，高金锡的岳父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老党员、三民主义的信仰者，高金锡入国民党也是岳父的举荐，可是小姨宋宝珍和两个女儿秉洁、秉浩却作为解放军从延安归来。得知父亲惨遭杀害的悬案，她们又会作何感想？父亲一心想着教育兴国，整个身心都扑在教育上，共产党怎么会杀害他？这是不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嫁祸阴谋？高秉涵几度濒死终于抵达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艰难求生。他从火车站小贩做起，到考上大学、工作分配时要来到离大陆最近的金门，娶妻生子，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山东菏泽的亲人，然而两岸隔绝，音讯渺无。终于在1979年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那一天，挚爱他的母亲却再也等不到他的消息，撒手人寰。直到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解除，台湾人终于可以回大陆探亲了。从那以后，高秉涵致力于两岸亲情的联系事业，为乡亲们送骨灰罐，为家乡兴资捐助，漫漫回家路得以绵延展开。

高秉涵是一个两岸关系史的见证人，时代革命和政治的巨大漩涡使他和家人不能幸免于外，也因此成就了他和家族的历史。父亲的惨死使他背负着亲人的“血债”踏上流亡之路，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断过有一天要重回家乡的念想。中国人热爱故土、重视乡土人情，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文化情结。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经历承受的苦难也可以说最为深重。凤凰涅槃，老树繁花，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生命力的写照。曾经的苦难不堪回首，但是正视苦难，铭记苦难，苦难就会转变为民族的财富、民族新的生机活力。高秉涵作为一介平民，身处台湾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却时刻难忘与大陆那割舍不断的血肉亲情，当年退走台湾的60万老兵又哪一个不是如此呢？或是父母妻子、或是兄弟姐妹、或是恋人朋友，就是他们到死都魂牵梦萦、难以放下的心事。这心事也是两岸亲宗同根、血浓于水的民族文化认同情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海峡两岸在中华文化的认同上基本上是统一的。长篇小说《回家》的推出，及时呼应了大时代里的大政治机遇与挑战。人们需要回顾那段历史，回到那段因革命、政治而使亲情断了、家人相隔的岁月，也回到更早更长久的曾经是一家的温暖回忆。《回家》既形象地折射出海峡两岸风雨60年的沧桑历史，也强烈地表达了期望国家统一、人民和平和睦的民意民心，更抒写了中华民族情感相通、精神相依的文化渊源与亲和力。

《回家》的叙事也很有特点。作为一部有真实人物原型的传记小说，故事的虚构成分相对会少一些，这多少会妨碍小说叙事空间中更多戏剧性冲突的展开。由于小说表现的时间跨度长，众多人物的性格、命运在纪实的流程里，反而变得不好塑造和把握。作家以超常的结构才能和叙述才华拿出了一部真实感人的作品。深厚的小说语言功力，战争场景的鲜活再现，故事情节的流畅细腻，主人公性格的成功塑造，使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相关题材中的第一部上。作家关于国民党军败1948年冬至1949年10月的溃退撤离，由于视角是一个12岁男孩的，更生动感真实地揭开了人类战争描写中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那么多生命如蝼蚁一般轻轻覆灭，那么多人承受不了身体和心灵的压力极限自行了断，其残酷和无情直指人性深处。这一部分内容是女作家张慧敏的独特贡献。

主人公高秉涵也使我们深思，台海两岸沧桑60年的风雨经历从来不曾动摇他对家乡的向往，除了血亲、亲情，还有什么更深重的东西吸引着他？而台湾还有多少这样的高秉涵？《回家》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一个民族作为文化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看到两岸文化认同的巨大能量与可能性。



# 军旅长诗如何写得大气

——由长诗《铿锵之韵》所想到的

□曾凡华

古往今来，诗人与哲学家一直都在探寻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意义。哲学家的逻辑是以现实、事实和理智为基础的，因此是更真实和本质的。相比之下，诗人的逻辑是以情感、感觉和想象力为基础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荷马和柏拉图，都是平易而深刻的，只是前者更具吸引力更易为人理解罢了，因为它不是以复杂的讨论方式来阐明理论的深刻，而是借助诗的钥匙来开启思维的理解之门。

胡松夏是一名现役士兵，又是一位诗人。他在紧张而有序的军旅生活中，不乏诗的哲思，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拿起“诗的钥匙”，试图开启现实生活的理想之门。他最近创作的长诗《铿锵之韵》便是明证。尽管还不是臻善臻美，却是他作为一个士兵诗人对社会人生的哲学考量和诗意描述。

诗歌是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重要途径。《铿锵之韵》写的是共和国国防油料科研堪称辉煌的一段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严寒区内燃机油问世，到成功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太空防雾剂，作者以其诗意的语言，形象地刻画出了一代代油研人的风貌。他们临危受命、因陋就简，凭着“一把丁字尺/一只油滴子”，“被时代的巨浪推到了/共和国军队油料研究的‘零公里’处……”长诗以油料科研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段为架构，通过几位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来谋篇，在诗意的叙述中，将读者引入到哲学思考的层面：“没有超常的思维/就不会有活塞式飞机的横空出世/没有刻苦的钻研/就不会有飞离地球的自由翱翔……”

整部长诗洋溢着一种澎湃的激情，这也许因作者成天与油研人打交道有关。耳濡目染之间产生了诗灵感，并以这种灵感来表达自己的想象和感受。但是，写诗并非复制事实存在的经验，而是一种创造及其创造的

过程。这就需要基于现实并超越现实，使之达到更高、更深的精神层面。荷马描述人类的奥德赛之旅，表现人的魅力和勇毅，就是通过诗意的叙述，来弘扬人性之美，同时也鞭答恶行、揭示某种兽性的卑劣。诗歌作为一种内在的需求，是一种独特的对自己和世界的冥想方式，如果被类似有同感的读者发现，愿意与其分享诗的意境，那么诗句就会奇迹般地充满生机，在富含强烈情感、纯洁理念和丰富含义的诗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点，从而产生一种诗的愉悦。显然，胡松夏是深谙此道的，他的长诗《铿锵之韵》也无疑有与之共鸣的读者群，因为军人视“油料”为战争的“血液”，特别是现代战争，更须臾不可或缺。我至今仍记得在当年边境作战前线，每每到藏匿于草丛间的战地输油管线时，那种久旱逢雨般的感觉。古代的战争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代战争，“先行”的就是“油料”。当然，对于诗而言，“油料”只是一个具象，而诗歌则需要搭建意象之堡垒，这种精神的堡垒，才是诗人安放灵魂之所在。

在长诗《铿锵之韵》中，胡松夏是试图搭建这种意象堡垒的。他借鉴交响音乐的结构，将作品分为五个乐章，前有序曲，后有尾声，其中也不乏华彩乐段。但在搭建的过程中，用的多是具象的建筑材料，缺少意象的空灵和飘逸。这并不是要他放弃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虚构没有基石的海市蜃楼，而是希望他基于和工作有关的现实和物质，实施诗的重构，将悉心观察、身体力行工作中的种种特征和韵律，以诗的语言和音符记录下来。除了时刻关注那些重大主题之外，在描述它的时候需回归到语言，而语言的开始便是想象，诗的意见则是现实世界的前意象，诗的节奏也是交替着的前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是诗人的时间光谱。诗说到底其实是内心的建

# 革命、政治中的亲情及文化认同

——张慧敏长篇小说《回家》读后

□何 英